

# 台梵關係：1949 年到現在

梁潔芬<sup>1</sup>、李允中<sup>2</sup>

中梵外交關係始自 1942 年的南京國民政府，但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台灣後，轉而發展為台梵關係。本文從歷史觀點討論 1949 以降，歷經蔣經國（1910~1988）、李登輝（1923~）、陳水扁（1950~）、馬英九（1950~）四位總統任內，從台灣觀點剖析台灣和教廷發展的雙邊關係。至於 1978 年中國大陸門戶重開後，梵蒂岡希望與北京重建外交關係，使台梵的雙邊關係發展成中梵台的三邊關係，本文雖有涉及，但蔡英文總統任內新的情勢發展，將另文詳述。

## 一、導言

台灣—梵蒂岡關係（台梵關係），<sup>3</sup> 顧名思義是中華民國與

---

<sup>1</sup> 本文作者：梁潔芬，耶穌寶血會修女，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系博士，專長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等，是國內外知名的研究中梵關係學者。曾任教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及社會學系，以及澳門天主教大學等。亦曾協助台灣文藻外語大學成立國際事務學系，目前是文藻外語大學研究教授。

<sup>2</sup> 本文作者：李允中，英國杜倫大學政府及國際事務學院哲學博士，曾任職於文藻外語大學研究發展處，現任台中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sup>3</sup> 梵蒂岡是在羅馬梵蒂岡山上面積 0.44 平方公里的城邦，屬聖座的全權管轄，於 1929 年訂定的《拉特朗條約》而生的。梵蒂岡是個宗教王國，由教宗管治。它是教宗聖座的屬土，也是天主教的中

教廷的外交關係。這關係始自 1942 年的南京國民政府和教廷建立的中梵關係。但在 1951 年毛澤東（1893~1976）領導的共產黨統治大陸後，中梵關係因教廷駐華公使、摩納哥籍黎培理（Antonio Riberi, 1897~1967）總主教於 1951 年被逐而中斷。1952 年梵蒂岡將駐華公使館遷到台北，繼續與國民政府維持外交關係。可是，到了 1978 年中共領導人鄧小平（1904~1997）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台灣和教廷的外交關係受到威脅。

1978 年以後，北京和梵蒂岡有意朝向藉由訂立協議（Concordia），修好中國和梵蒂岡的衝突關係。1978 年 11 月，中共總書記趙紫陽（1919~2005）與馬尼拉總教區辛海綿（Jaime Lachica Sin, 1928~2005）樞機會面時，答應雙方有關官員準備文件細節，準備中國和梵蒂岡正式和談，重建中梵外交關係。<sup>4</sup>

為避免混淆，本文統稱中國大陸和梵蒂岡的關係為「中梵關係」，稱台灣和梵蒂岡的關係為「台梵關係」。辛海綿和趙紫陽的會面，應該是一道清晨曙光，照亮日後中梵修好及台梵將來發展的道路。中梵談判經過卅一年後（1987~2018），似乎冉冉初升的曙光，將有艷陽高照，因為在正式談判前有了為期兩年的臨時協議，逐漸解決橫亙在道的棘手問題，希望達致令雙方滿意的結果。

---

央行政機構，它是國際法所承認的主權國。梵蒂岡包括教宗和羅馬教廷（天主教會的中央行政機構）。教宗不僅是梵蒂岡城的一國之君，也是全球天主教的最高領袖。

<sup>4</sup> 這是當時陪同辛海綿樞機訪問北京的西班牙籍顏哲泰（Jose Calle S.J., 1922~）神父，於 1990 年告知作者。

本文旨在討論自 1949 以降至馬英九總統時期(2008~2016)，從台灣的觀點去剖析台灣和教廷發展的雙邊關係。在蔣經國(1910~1988)、李登輝(1923~)、陳水扁(1950~)、馬英九(1950~)四位總統任內，政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冷戰後期的國際政治走向，處處影響著台梵關係，這點在本文亦加以討論。

## 二、1990 年代到現在有關的研究

探討 1990 年代至今有關台中梵關係的研究，大致可列舉如下：1993 年 George Crane 在文化差異的脈絡下，討論台海統一的各種大小障礙；<sup>5</sup> 易浩德 (Michael Yahuda, 1940~) 撰文詳述台灣在 1990 年代的外交；<sup>6</sup> 梁潔芬分析在 1976~1986 年大陸開放初期的中梵衝突關係時，順道引出台梵關係；<sup>7</sup> 趙文詞 (Richard Madsen, 1941~) 撰寫天主教在華歷史時，不忘台梵關係扮演的角色；<sup>8</sup> 梁潔芬和王志堅從台灣的角度討論中梵台三邊關係，建議台灣關係若有變化時，宜有應變之法；<sup>9</sup> 台灣學者陳方中

---

<sup>5</sup> George Crane, "China and Taiwan: Not Yet 'Greater Chi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69.4 (1993), pp. 705~723.

<sup>6</sup> Michael Yahuda, "The International Sta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148 (1996), pp. 1319~1339.

<sup>7</sup> Beatrice Leung, *Sino-Vatican Relations: Problems in Conflicting Authority 1976~19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up>8</sup> Richard Madsen, "Catholic Revival during the Reformed Era", *The China Quarterly* 174 (2003), pp. 468~487.

<sup>9</sup> Beatrice Leung and Marcus Wang, "Sino-Vatican negotiations:

(1963~)和江國雄(1944~)以中文撰寫中梵關係史，從政治史的角度審視這錯綜複雜的關係。<sup>10</sup>最近，陳聰銘參閱法文檔案後，用中文撰寫中梵關係 1912~1978 年的發展。<sup>11</sup>梁潔芬及王志堅討論中梵談判和談判的主要阻擋時，也談及台灣問題。<sup>12</sup>

### 三、雙邊關係、三邊關係，和核心問題

從政治角度看，「中國因素」在台灣國民政府和梵蒂岡雙邊關係的發展上，佔重要的位置。從國府遷台到現在，只有從 1949 年至 1978 年間，台灣對教廷的外交關係沒有受到干擾。因為當時毛澤東忙於發動整治異己的政治運動和社會改革，沒空理會教宗向他示好的象徵訊息，所以他在有生之年（1976 年去世），北京和梵蒂岡沒有甚麼接觸。

鄧小平在 1978 年推出門戶開放政策，使梵蒂岡向北京伸出修和的橄欖枝。從此雙邊的台梵關係演變為中梵台三邊關係。北京從開始中梵談判之日起，不斷要求中斷台梵關係是重

---

Problems in Sovereign Right and 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3 February 2016), pp. 467-482.

<sup>10</sup> 陳方中、江國雄，《中梵外交關係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3）。

<sup>11</sup> 陳聰銘，《中梵外交史：兩岸與教廷關係（1912~1978）》（台北：光啓文化，2016）。

<sup>12</sup> Beatrice Leung and Marcus Wang, “Sino-Vatican Negotiations: Problems in Sovereign Right and 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3 February 2016), pp. 467-482.

建中梵關係的先決條件。<sup>13</sup> 所以有證據顯示，中梵關係的核心問題來自北京。梵蒂岡既是台灣國民政府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以梵蒂岡小國為平台，展開台灣和歐洲各國發展文化、商務、學術等非外交關係，這是台灣進行對外關係的藝術。

## （一）中梵台三邊關係

### 1. 中梵關係：權力的衝突

依中國數百年傳統對政治的說法，政府與宗教團體的關係就是「權力衝突」的關係。在現代社會天主教所蘊藏的有神論下的宗教理想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信奉的無神論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型上是互為柄鑿，不能相容。<sup>14</sup> 中共以辯證法為基礎而訂的「宗教自由」政策，雖給局外人宗教自由在中國大行其道，和西方國家沒有兩樣的印象；但骨子裡，黨國對宗教的操控，從毛澤東時代到習近平（1953~）執政，沒有稍停，只是執行時的鬆緊緩急，就依政治氣候而定。<sup>15</sup>

中梵關係的衝突，除了意識型態的衝突外，還有中梵兩個主權國家在行政權力上的衝突。梵蒂岡談判的目的，旨在與中共建立較和諧的關係，以利大陸天主教會不受政治滋擾，而能

---

<sup>13</sup> 同上。

<sup>14</sup> Leung, *Sino-Vatican Relations*.

<sup>15</sup> Beatrice Leung, "China's Religious Freedom Policy: An Art of Managing Religious Affairs", *The China Quarterly* 184 (2005), pp. 894~913.

正常運作和發展。

## 2. 在中共威脅下的台梵關係

如上所述，台梵關係在中國大陸的陰影下生存，因為北京與梵蒂岡談判建交的最主要目的，是割斷台梵外交關係，將台灣從國際社會中推到邊緣，更形孤立，最後迫使它回到兩岸統一的談判桌上，依大陸的條件而談判。台北自 1971 年起，不能以主權國家的身分與聯合國會員國建立外交關係，或參加需要以國家名義參與的國際組織。台灣退出聯合國，使大量外交關係由台北轉移到北京。

其實，在國民政府尚未離開聯合國之前，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本可在中共加入後得以保存，如果蔣介石（1887~1975）接受美國的提議，跟隨南北韓和東西德在聯合國共存的模式，與中國大陸雙雙出席，作雙重代表便可。但蔣氏執著「漢賊不兩立」的心態，使台北的外交政策僵硬，並大量流失邦交國。<sup>16</sup> 1970~1980 年代，大量國家的大使館由台北遷到北京。當馬英九總統在 2008 年 5 月就職時，全球只有 23 個在中南美洲的小型國家和台灣有外交關係，<sup>17</sup> 只有在一小撮的國際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台灣仍為會員。<sup>18</sup> 台灣民衆不滿於被大陸在

---

<sup>16</sup> Li Yun-chung Tony, *Taiwa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1949 to the Presen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d.), p. 38.

<sup>17</sup> "ROC Trade Partners Ranking List 2008", ROC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Information ROC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Information.

<sup>18</sup> Wang T. Y., Lee Wei-Chin and Yu Ching-Hsin, "Taiwan's Expansion

外交上的打壓，要求政府重返國際舞台，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所以台灣的政治領袖順應民意，盡力減輕由北京而來的外交壓力。馬英九在 2008 年就職演說時，呼籲國際社會勿再孤立台灣，請求在兩岸關係融洽前，給予台灣國際空間。<sup>19</sup>

在此情況下，台梵的外交關係，是台灣國民政府外交活動上的重中之重；作為執政黨，若喪失梵蒂岡的邦交，尤其將為台北的外交蒙受巨大的損失。馬英九執政時，很小心維護台梵邦交，避免這個外交上的打擊，招致民進黨的攻擊。

## （二）由南京到台北的中梵關係（蔣介石時代，1942~1975）

1942 年，當南京國民政府和教廷建立外交關係時，派出謝壽康（1897~1973）為全權公使，代表國民政府進駐梵蒂岡。第二屆國民政府駐梵蒂岡代表，是著名學者吳經熊博士（1899~1986，1946~1949 在任）。他在任內，冀望將「全權公使」的職級，升格為「全權大使」。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在內戰中，節節敗退，在 1949 年 1 月 16 日從南京撤退到廣州，所以對吳經熊的建議無暇理會。當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忙於處理於 1949 年底再撤退到台灣時，國民政府駐教廷的公使館的公使職位於 1949~1954 年懸空。當時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1876~1958），婉拒

---

of International Spac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69 (6 February 2011), pp. 249~267.

<sup>19</sup> Ma Ying-jeou, “Taiwan’s Renaissance: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Address”, *Taiwan Today*, 23 May 2008.

中華民國派公使填補空位，有其政治考慮。<sup>20</sup> 當 1949 年政權易手時，教宗代表黎培理總主教，於西方國家的代表團紛紛撤離中國時，他獨留守南京，希望能向新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毛澤東，呈遞國書，繼續中梵關係。但中共將黎培理驅逐出境。<sup>21</sup> 中梵的外交關係在大陸方面中斷了，轉而在台北繼續。

黎培理被驅逐出境，到達香港；當時梵蒂岡猶豫是否應派人到台灣，重續中梵關係。然而，因教廷內部分官員仍抱有與北京建交的美夢，<sup>22</sup> 所以對在台北恢復中梵關係相當冷淡。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在迫害教徒的行動上升級，操控著天主教會，獨立辦教的要求無日無之。這些宗教迫害行動間接道出，在毛澤東治下的大陸，恢復中梵邦交是不可能的事。

南京總主教于斌（1901~1978）在 1949 年前，已和國民政府發展了親密的關係，他成功地遊說蔣介石在台政府，邀請被逐的教廷公使黎培理到台灣，重建教廷駐華大使館，在台灣恢復中梵關係。隨著黎氏 1952 年抵台，中梵的雙邊外交關係就建立起來。<sup>23</sup>

在教宗庇護十二世治下，梵蒂岡爲了不想刺激中共，使它

---

<sup>20</sup> 陳方中、江國雄，《中梵外交關係史》，223~232 頁。

<sup>21</sup> 蘇若裔，《中國近代教難史料（1948~1957）》（新北：輔仁大學，2000），29~51 頁。

<sup>22</sup> 陳方中、江國雄，《中梵外交關係史》，238~243 頁。

<sup>23</sup> 同上著作，244~251 頁。



再迫害大陸教友，不太願意與台灣建立親密關係。教宗於 1948 年要求于斌總主教滯留美國，<sup>24</sup> 阻止他以反共言論，在國際間為國民政府進行遊說，以及參與台灣政治。<sup>25</sup> 1949 年中共宣布于斌為戰犯。<sup>26</sup> 庇護十二世分別頒布《我們切願聲明》(*Cupimus Imprimis*, 1952) 文告及《致中國人民》(*Ad Sinarum gentem*, 1954) 通諭，指責中共迫害天主教徒，以及推出「三自」政策，<sup>27</sup> 強迫中國天主教徒與教宗脫離關係後，教宗對此政策，橫眉冷對。<sup>28</sup> 梵蒂岡未幻想在這段時期可與北京有友善關係；毛澤東則認為，傳統上與民主西方社會友好的天主教會，冷戰時期在意識型態上站在中國的對立面，也無意與它建立友好關係。這解釋為何這時期台梵關係穩如泰山，不受大陸的威脅。

1958 年新教宗若望廿三世(Pope John XXIII, 1881~1963)即位，他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比較開明，不像庇護十二世那樣反共。他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梵二, 1962~1965)，以革新教會，台灣主教獲邀參加會議。中共政府禁止大陸的主教參加，聽說

---

<sup>24</sup> 在 1948 年于斌在美國遊說美籍華人和美國教會去反共。當時南京已陷入共產統治，國民政府遷至廣州，準備再到台灣。教宗下令于斌留居美國，不能返廣州或台灣與國民政府會合。

<sup>25</sup> 陳聰銘，《中梵外交史》，265~267 頁。

<sup>26</sup> 陳方中、江國雄，《中梵外交關係史》，226~232 頁。

<sup>27</sup> 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陳聰銘，《中梵外交史》，242~246 頁。

<sup>28</sup> Elmer Wurth and Betty Ann Maheu eds., *Papal Documents Related to China 1937~2005* (Hong Kong: Holy Spirit Study Centre, 2006), pp. 57~72.

教廷通過埃及領事館發出邀請，但北京當局沒有回音。<sup>29</sup> 因爲毛澤東的閉關鎖國政策，國家規定人民不准踏足西方國家。這亦解釋中國天主教會長年與普世教會隔絕，以致在 1980 年代中共實施改革開放後，中國教會在梵二革新的神學和禮儀上，需要重新學習。

1963 年教宗保祿六世 (Pope Paul VI, 1897~1978) 登基，他深受現代歐洲流行的社會主義影響，接納共產主義在社會已存在的現實，所以教廷國務卿加薩羅里 (Agostino Casaroli, 1914~1998) 樞機，向蘇聯及東歐共產主義國家推出妥協的東方政策 (Ostpolitik)。<sup>30</sup> 梵蒂岡亦改用友好的政策準備和北京交談。

保祿六世在預定場合向中共招手。首先在 1965 年 5 月 31 日，他發電報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領袖 (中美蘇三國)，呼籲共同以和平方法解決越南戰爭 (1955~1975) 問題。那封發去中國的電報，是給毛澤東本人，但毛澤東連禮貌的回覆也欠奉。<sup>31</sup> 再次於 1965 年 10 月 4 日，他在聯合國演講時，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加入聯合國。<sup>32</sup> 後於 1966 年 1 月，教宗又致新年賀電給毛澤東，對方依舊沒有回音。至 1976 年，教宗公開表示願意與中國開啓某種形式的接觸，但聲音落在聾子的耳朵裡。中

---

<sup>29</sup> 陳聰銘，〈中梵外交史〉，324 頁。

<sup>30</sup> Handjsekob Stehle, *Eastern Politics of the Vatican 1947~1979*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1).

<sup>31</sup> Wurth and Maheu, *Papal Documents Related to China 1937~2005*, p. 152.

<sup>32</sup> *Acta Apostolica Sedis*, 1965, p. 880.

方的沉默是緣於當時毛澤東治下的中國，沉醉於文革前林林總總的政治運動和社會改革中，以致無暇他顧。

1970年，中共釋放美籍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 M.M.，1891~1981）主教，為準備中美建交而鋪路，誘使梵蒂岡在1970年代以更公開的方式向中共招手。當保祿六世首次訪問亞洲和大洋洲時，香港這塊英國的殖民地，原本不在行程上，但因中國大門不向外國人開啓，若到台灣又覺得不妥，雖然香港政府冷然接待，但他硬著頭皮仍要前去香港向中國喊話，這是教宗的唯一選擇。教宗在香港停留半天，就向中國開腔了。此舉表示教宗保祿六世如何渴望與中國的靜默教會接觸。<sup>33</sup> 當教宗訪港時，香港政府不向台灣教友簽發入境證，台灣教友無緣面見教宗，引起他們不滿。那個台灣的朝聖團體，由前駐教廷公使吳經熊率領，內有主教、神父、修女和平信徒，他們只好赴馬尼拉謁見教宗，與全體台灣主教參與教宗主持之亞洲主教會議，其中議程是台灣要求加入彈劾共產主義的動議。<sup>34</sup>

### （三）教宗保祿六世「兩個中國」政策（1963~1978）

孟棣義（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樞機當選教宗保祿六世之前，曾主理教廷的外交事務多年，所以他接受共產主義崛起的現實，以及他和國務卿加薩羅里樞機推出東方政策，對付東歐

---

<sup>33</sup> Leung, *Sino-Vatican Relations*, pp. 193~196

<sup>34</sup> 陳方中、江國雄，《中梵外交關係史》，319~323頁。

共產國家的策略，從衝突轉變到適應。<sup>35</sup> 保祿六世的「兩個中國」政策，是以辯證法為主。<sup>36</sup> 在他即位初期，美國領導的西方國家與蘇聯領導的共產國家對抗，進入冷戰時期，當時軍備競賽、核武恐嚇無日無之。核子戰爭隨時可能爆發，全人類或會在瞬息之間突然毀滅。聯合國雖然自稱捍衛和平，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排難解紛的角色，但畢竟它能發揮的作用有限，而核子大戰有一觸即發的可能。

保祿六世的「兩個中國」政策，就是為表示善意，向北京政府伸出友誼之手，同時也對台灣的關係不斷升級。其實保祿六世的做法，與美國雙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是同一道理，所以他支持美國雙重承認海峽兩岸國共並存、共進聯合國的觀點。其次，雖然聯合國受大國左右，畢竟它仍是個推動和平、削減衝突機會的工具。<sup>37</sup>

當保祿六世 1965 年在聯合國大會上演說時，他公開建議中國應該加入聯合國。1968 年，他去信給聯合國秘書長，重提中國應該加入聯合國的建議。為台灣而言，這些建議相當不友善，因為提議中國加入聯合國，等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主權國家。

這邊廂，保祿六世於 1969 年，突然將于斌總主教擢升為樞機，使台灣教內教外驚喜異常。于斌樞機是個傳奇人物，始

---

<sup>35</sup> Stehle, *Eastern Politics of the Vatican 1947~1979*.

<sup>36</sup> 陳方中、江國雄，《中梵外交關係史》，307~310 頁。

<sup>37</sup> 同上著作，307~317 頁。

自南京的日子，他與國民黨的關係深厚，是國民黨的寵兒，是共產黨要追殺的戰犯，亦是梵蒂岡要他閉口的人物。于斌擢升為樞機，是梵蒂岡玩「兩個中國」牌的一步棋；<sup>38</sup> 台灣政府和教會認為，這表示教廷容忍于斌的反共立場。

1971 年 10 月 25 日，台灣駐聯合國代表宣布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聯合國投票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會員。此後，國際社會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際社會一員。

在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同日，教廷駐華大使葛錫迪(Edward Idris Cassidy, 1924~) 總主教被召回羅馬；梵蒂岡在台北的教廷大使館空置了數月後，梵蒂岡派高樂天(Francesco Colasuonno, 1925~2003) 蒙席以臨時代辦的官階，主理教廷駐華大使館。其實，能有一名代辦駐台北已算國民政府走運了，這是羅光(1911~2004) 總主教和加薩羅里樞機經過艱辛和漫長談判的結果。<sup>39</sup> 因為東方政策之父加薩羅里樞機有意放棄台灣，他的寶都押在北京身上。<sup>40</sup> 從那時起，座落台北的教廷駐華大使館已經降格，至今一直由代辦級外交官主理。這是梵蒂岡對北京釋出善意，邀請它對話，朝向中梵關係正常化的一項行動。<sup>41</sup> 中梵關係正常化

---

<sup>38</sup> 陳聰銘，《中梵外交史》，355~367 頁。

<sup>39</sup> Leung, *Sino-Vatican Relations*, pp. 48~72.

<sup>40</sup> 陳方中、江國雄，《中梵外交關係史》，338~342 頁。

<sup>41</sup> 戴瑞明，〈教廷外交與當前中梵外交關係〉，《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輔仁大學歷史學系，2002），9~13 頁。

雖是台梵關係的一大威脅，但台方有意與梵蒂岡保持外交關係，儘管遭對方降格，它仍保持大使級別的官員常駐梵蒂岡。

#### (四) 中梵關係正常化 (蔣經國、李登輝任內, 1975~2000)

毛澤東於 1976 年逝世，梵蒂岡對修和的善意，在毛的繼承人華國鋒 (1921~2008) 身上，也發揮不了作用。因為 1979 年 11 月華國鋒訪問義大利的時候，也沒有與教廷打個招呼；他沒有禮貌性地訪問梵蒂岡，與教宗見面。

鄧小平 1978 年的改革開放政策，也開啓了梵蒂岡和北京對話與談判的可能性，依協議的模式去重建中梵外交關係。首先在 1980 年 6 月，被囚達 22 年的廣州總主教鄧以明 (1908~1995) 獲釋後，可以到國外訪問；此舉乃是北京想藉此，試探國際對它的開放政策的反應。1981 年 2 月，加薩羅里樞機本來陪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Pope John Paul II, 1920~2005) 訪問遠東，到達馬尼拉之後，他臨時改變行程，專程飛往香港，與鄧主教見面，並在香港的記者會上，表示梵蒂岡希望與北京對話。<sup>42</sup>

在同一旅途中，若望保祿二世也從馬尼拉向中國喊話。在一個充滿熱情的演講中，教宗談到在教會內四海皆兄弟的道理，他肯定一個良好的基督徒，一定是個良好的中國公民。可是北京對教宗這番話不為所動，國內報紙對教宗的遠東之行，及加薩羅里樞機的香港之行，隻字不提；政府官員只冷淡回應說：中國和梵蒂岡沒有邦交，中梵建交的先決條件，是切斷台

---

<sup>42</sup> Leung, *Sino-Vatican Relations*, pp. 203~210.

灣和梵蒂岡的外交關係。<sup>43</sup>

梵蒂岡又利用紀念利瑪竇（Matteo Ricci, S.J., 1552~1610）來華 400 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對北京表示友好。利瑪竇是明末來華的傳教士，是當時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的橋樑，希望藉此橋樑把中梵關係建立起來。<sup>44</sup>

台灣方面，舉凡梵蒂岡對北京有任何舉動，台北都小心觀察和分析，不敢懈怠，尤其是它對北京示好的行動與言論，就使台灣特別緊張，因為會影響到它的外交。其實始自中日戰爭（1937~1945），國民政府和天主教的關係便非常密切，台灣教會方面也自然對梵蒂岡的親大陸言行十分關注。台灣主教在 1983 年 11 月 13 至 14 日在台北與教廷萬民福音部秘書長、印度籍 Duraisamy Simon Lourdasamy（1924~2014）樞機見面，表達他們不滿當教宗對大陸示好時，白眼對待台灣教會。這消息馬上被帶到教宗跟前。<sup>45</sup>

教宗接到台灣呈交的文件，知道台灣主教怨氣沖天，於是在 1984 年 2 月，未到法定的主教述職時間，<sup>46</sup> 教宗便請台灣主教到教廷面談。台灣 7 位主教有機會面見教宗和教廷官員，吐露教廷對華政策令他們憂心忡忡。他們對中共要求切斷台梵

---

<sup>43</sup> 同上著作，210~212 頁。

<sup>44</sup> 陳方中、江國雄，《中梵外交關係史》，371~376 頁。

<sup>45</sup> 同上著作，378~390 頁。

<sup>46</sup> 教會的法律規定，全球的地方主教每 5 年一次要到梵蒂岡，向教宗及有關部門的長官述職一次。

外交關係，向教宗及教廷官員曉以利害。他們認為台梵斷交，將嚴重打擊台灣天主教徒的士氣。顯然，他們這趟行程和陳情的內容，有國民政府的意願在內，可以說，他們也代表台灣政府表達心意，他們害怕教廷向中國示好時，台灣會被犧牲。<sup>47</sup>

台灣主教向教宗要求，倘若梵蒂岡日後對北京有任何行動，可以第一時間獲得通知，教廷為撫慰這群憂慮的主教，答應不會為締結中梵關係而出賣他們。<sup>48</sup> 最後，教宗邀請台灣教會與海外華人信友，築起中國與普世教會溝通的橋樑。<sup>49</sup>

1987年11月，當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北京接見馬尼拉辛海綿樞機，談及中梵關係時，兩人同意，屬下部門準備開始正式的中梵談判。辛趙會談給人新希望，中梵修和指日可待。在這個時期，有相當多不同民間層面的非正式交往，可以總結下來，放在談判桌上的，有下列四項：（1）中梵雙方在選派主教時，如何合作和分享指派權；（2）找尋最佳辦法，把政府操控的「天主教愛國會」所管轄的教會團體，和沒有政府操控（俗稱地下）的教會團體合而為一；（3）日後在北京的教宗代表，如何與地方主教聯繫；（4）日後若把台北的教廷駐華大使館遷

---

<sup>47</sup> 羅光總主教的日記裡，談及他和政府官員及李登輝總統交往。其中記載李登輝總統請羅光遊說教宗於1988年訪問台灣。羅光由羅馬歸來後，向李總統報告他如何按旨行事。參見羅光，《牧廬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511~525頁。

<sup>48</sup> Leung, *Sino-Vatican Relations*, pp. 231~238.

<sup>49</sup> Elmer Wurth, ed., *Pap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New China 1937~1984*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5), pp. 177~179.



到北京時，有何良方善策，對台灣造成最少的傷害。

上述有關中梵建交的技術問題，未有解決方案之前，1999 年 8 月中方又提出兩個梵蒂岡難以接受的條件，使荊棘滿途的中梵談判雪上加霜。這兩個有違《天主教法典》的條件是：(1) 地方主教的行政權，轉移到政府機構手上；(2) 在共同委任主教時，依當時的做法，先由政府委任，再由教宗批准。在委任主教問題上，梵蒂岡不能違背教律，接受中方的建議，因為《法典》清楚列明，唯教宗有委任主教的權力。<sup>50</sup> 中方的提議沒有依協議精神共同指派主教，而指派權單獨操在北京政府手中，梵方只是有權確認政府的指派而已。

1999 年 10 月 19 日，中共的統一戰線部門在北京召集會議，討論有關中梵關係的問題，只有一部分主教被邀請參加討論，內容是一旦中梵外交關係建立起來後，中國要如何部署。北京官員坦然承認中梵關係是重要的，因為與教廷和教宗這個國際道德的權威建立起關係，令中國的國際形象升級。中國的分析家也認為，中梵關係能否正常化，要看中國在外交和國內政治的需要而定。

1999 年 10 月 25 日，梵蒂岡的發言人 Navarro Valles 開腔說，眾所周知梵蒂岡很願意，與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建立邦交。他的話音未落，中共的外交部副部長便說：中國很願意在兩個條件下，和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這就是：

---

<sup>50</sup> *Code of Canon Law*, Can. 333, 377 §1, 377 §5.

(1) 梵蒂岡中斷與台灣的外交關係；(2) 梵蒂岡不能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包括宗教事務。<sup>51</sup> 中國早自 1987 年起，便提出這兩個條件，如今已經成爲口號或指定動作了。

實際上，中梵關係最深層的癥結是「權力衝突」。2000 年 1 月 6 日，北京「自選自聖」5 名主教是權力衝突具體化的表現；這樣的非法主教祝聖，日後陸續發生，反映當時中梵衝突的嚴重程度，因爲沒有教宗任命而祝聖主教，是挑戰教會的底線，必定不利於中梵談判。這次自選自聖主教，從時間上來看，典禮的舉行，恰於教宗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祝聖 12 名司鐸之前數小時，所以外國記者以「北京公開奚落教宗」爲標題，報導這次自選自聖事件。<sup>52</sup>

### (五) 梵蒂岡有意解開中梵談判的死結

(陳水扁總統時期，2000~2008)

2005 年 11 月 21~26 日，教廷前外交次長陶然 (Jean-Louis Tauran, 1943~2018) 樞機作非官式訪問台灣，代梵蒂岡給台灣人民傳遞它近來的活動訊息，這活動自然包括向台灣談及教廷的動向。他以「梵蒂岡外交」爲題，在台北及高雄兩地各作一場公開演講。在演講中，他以圓滑的外交辭令，應允台灣人，教廷不會拋棄他們，即使不久將來台梵關係會由外交關係，改爲文化和社會性質的交往。他公開承認，現在設於台北的「教廷

---

<sup>51</sup> *International Fides Service*, 12 November 1999, no. 4172, NE 629.

<sup>52</sup> Jasper Becker, "Beijing in Open Snub to Pop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7 January 2000, p. 1.

駐華大使館」，是昔日在南京的「教廷駐華大使館」，因政治理由於 1952 年遷到台北運作而已。日後若北京與梵蒂岡的關係正常化，大使館就應遷回中國去。<sup>53</sup>

台梵關係的性質若有改變，由外交性質變為文化和社會性質時，台灣可以考慮以下的部署，彌補台灣在國際上的聲譽和活動：

1. 開創梵蒂岡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的合作，這兩個全球最大的東西方博物館交換展品、共同舉辦活動等，定能吸引全球文化界的興趣，使台灣在國際舞台上以另一種形式展現。
2. 加強台梵兩地的學術交流。例如，在國家科技部強化與外國學者的合作研究計畫。與台灣無邦交的國家，亦有共同合作和交換計畫，梵蒂岡亦可加入合作名單中，加強學術文化合作和交流。
3. 將現時的大使館，作為台梵合作的綜合機構，派遣高級教士（例如總主教）主持業務。
4. 台灣政府應修訂法例，准許天主教中小學校內開設宗教課程。
5. 台灣教會可與政府合作，在大陸落後地區從事扶貧計畫，

---

<sup>53</sup> 筆者當時在台灣，專程聆聽陶然樞機在台北和在高雄的演講。筆者發現在台北，他較為詳細解釋台梵關係日後的發展，及以後遷館的事宜，而台北聽眾的問題也較為尖銳。

以增強橋樑教會的工作面。<sup>54</sup>

若台灣政府採用這些建議，不會湮滅在國際舞台上的台灣面貌，和梵蒂岡的關係也會不減反增。其實台梵來往，近年相當頻繁。前任教廷駐台代辦陸思道蒙席（Paul Russell，1959~，2008~2016 在任）奔走於台北和教廷之間，使台灣的大學和全球天主教大學學位和資格互相承認，亦成功地斡旋於中梵台政府之間，使每年大陸可派 30 名神父修女到台進修讀神哲學。他作為兩岸的橋樑，貢獻不小。

2006 年梵蒂岡的代表到北京作例行會議，給北京帶來鮮明的訊息：任何中梵交談，如果沒有互信就無結果可言。言下之意是，當時中梵談判膠著，沒有任何進展，是中梵之間缺乏互信之故。<sup>55</sup> 2010 年，中梵恢復談判：該年 2 月和 6 月的兩次談判，分別在羅馬和北京舉行。同年 7 月，教廷特使秘密訪問北京，討論一些敏感問題。據知情的教會人士透露，這次會談失敗，因為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1927~）拒絕在一份有關任命主教的草擬文件上簽署。

---

<sup>54</sup> Beatrice Leung and Marcus Wang,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among China, Taiwan and the Vatican: A Taiwan Perspective", Joseph Cheng ed., *Challenges and policy Programmes of China's New Leadership*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7), pp. 495~522.

<sup>55</sup> 由於缺乏信任，梵蒂岡代表拒絕在 2011 年的談判中簽署初步協議。因此，北京最高層的保守派領導人成為勝利的一方，並重新開始了單方面任命主教的激進政策。這是一位靠近北京的神父透露的消息。

## (六) 台梵關係回到穩定狀態（馬英九總統時期，2008~2016）

2010 年 7 月談判失敗的 4 個月後，在 11 月 21 日，就有郭金才（1968~）神父被非法祝聖為承德主教。這次自選自聖主教事件，使中梵談判馬上停頓。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是同年 12 月 7~9 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會議（八大）。中共領導人向與會者發言時，清楚要求他們：堅持愛國愛教的道路，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堅決抵禦境外勢力的各種滲透干擾，自覺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sup>56</sup> 事實上，八大已推遲了 4 年，在這個敏感時刻才倉促召開。由於這會議與教義教律相左，有些政府認可的主教依教宗的訓諭，表明不會參加，但中共當局用強制手段逼迫各個教區的主教出席。因此，在自選自聖主教和召開八大兩個事件上，使中梵關係降到冰點。<sup>57</sup> 海峽另一邊的台灣喜見中梵冷戰，間接顯示中梵建交遙遙無期，台梵關係因而暫時不會受損。

梵蒂岡是台灣在歐洲的唯一邦交國。若台梵外交關係不保，為馬英九政府是個重大打擊，給反對派民進黨痛擊執政國民黨的大好機會。當總統大選為期不遠（2016 年 1 月 6 日），北京傳出消息，願意馬英九連任，所以縱然時機成熟，中梵可依協議精神重建邦交，但以不利馬英九的選情為由，中方控制談判速度及內容，使建交一事在馬英九任內毫無進展。北京很滿

---

<sup>56</sup> 〈賈慶林會見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會議代表〉，《新華網》，2010 年 12 月 9 日。

<sup>57</sup> Leung and Wang, "Sino-Vatican Negotiations", pp. 467~482.

意馬英九的兩岸關係政策，因在其管治下兩岸關係十分順暢。

從政治角度看，海峽兩岸的關係和中台梵三邊關係密不可分。從中梵談判初期到現在（1987~2018），中方希望建立中梵關係，可在兩岸統一問題上有所助益，但在過去 30 多年來，尤其是在陳水扁總統時期的兩岸關係上，有著很大轉變，但梵蒂岡一直幫不上甚麼忙。北京方面對中梵關係另有考慮，在國際上與教廷和教宗建立關係，可提高中共的道德形象。

改革開放以來，包括天主教在內的宗教價值觀，在社會上為人接受的情況日增。儘管宗教內含有濃厚的道德成分，但事實證明北京政府不願意與宗教界合作，去推行社會道德。在胡錦濤（1942~）向全國推行道德教育，呼籲人民恪守道德以保全改革開放的碩果時，只採納儒家思想，以求重建社會道德。事實上，儒家學說中有很多取向，有崇尚自由主義，有執著於保守主義，有非政治化，亦有很濃厚的政治味道；北京小心翼翼地選擇非政治化的儒家學說，去發展社會主義倫理道德。<sup>58</sup>這表示北京灌輸社會道德倫理時，刻意避開宗教，為避免在教導權上無神論與有神論之間發生衝突。

#### 四、台灣對梵蒂岡認識不足

在台灣國民政府的部門中，門庭最冷落的就是外交部，因

---

<sup>58</sup> Timothy Garton Ash, "Comment & Debate: Confucius can Speak to Us Still—And Not Just About China: There is a Simplistic Way to Read This Renaissance of an Ancient Tradition. The Truth is Very Much More Interesting", *The Guardian*, 9 April 2009.

爲和台灣有邦交的是 20 多個在中南美洲和非洲的小國，它們對台灣發展外交無甚幫助，因爲這些小國在國際舞台的邊緣上，絕對發揮不了政治影響力。<sup>59</sup>

其實有些國家和台灣沒有正式邦交，但與台灣保持商業上、文化上的緊密聯繫，台灣亦與爲數不少的國家互派經貿和文化代表，例如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在蔡英文（1956~）總統就職時，就有 59 個國家近 700 名外賓來觀禮道賀，其中有副總統或副首相以及第一夫人。<sup>60</sup> 梵蒂岡是個神權國家，集「聖」與「俗」於一身。很多在台灣外交部歐洲司的官員，對基督宗教認識不夠深入，很難拿捏教廷的外交去向，他們看不清教廷何時扮演「聖」、何時扮演「俗」的角色。

【圖一】陳水扁（左上角）出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葬禮  
（取自維基百科網站）



<sup>59</sup> 這是由一位與熟識台灣外交部的人士透露的。

<sup>60</sup> 〈520 慶賀團「59 國 700 外賓」規模歷來之最〉，《東森新聞》，2016 年 5 月 20 日。

2005年4月2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駕崩的消息傳出，台灣外交部沒有牽頭部署陳水扁總統去梵蒂岡參加喪禮，卻由一名在台的天主教神父居中牽線，在外交部和教廷駐華大使館之間奔走，秘密地穿針引線，避開北京可能的阻攔，才使陳水扁的五人代表團到達梵蒂岡，參與有4名國王、5名皇后、50名總統和首相、45名宗教領袖參加的盛大喪禮和政要大聚會。

在羅馬，這個罕有的國際首腦非正式聚會中，美國代表團內有三名前任和現任總統，以及第一夫人和國務卿；反觀台灣代表團，有陳總統、兩位名不見經傳的天主教神父（其中一名是山地原住民）、一名回教阿訇和外交部長陳唐山（1935~）。將美國和台灣兩團相比，政治智慧立見高下。台灣方面不曉得這個既是宗教聚會，也能提供給參禮政要交往的重要平台。姑且不論陳水扁作客梵蒂岡時，自討沒趣的不智要求，<sup>61</sup> 光從參禮團的人選，便可知台灣政界當時摸不透梵蒂岡何時是「聖」、何時是「俗」。

2014年4月27日，由吳敦義（1948~）副總統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赴梵蒂岡參加教宗若望廿三世和保祿六世的宣聖典禮。吳氏在教廷的表現，相較於陳總統顯得中規中矩；但吳氏為非天主教徒，在典禮彌撒中去領只有教徒能領的聖體，從宗教的角度看吳氏，此舉是褻聖，在宗教上是嚴重的過失。人們批評

---

<sup>61</sup> 陳水扁到梵蒂岡後，要求會見處理台灣事務的教廷官員，為教廷所拒。陳總統沒有外交常識，不體諒整個教廷上下忙著治喪和接待眾多國際領袖，此時並非談台梵關係的場合。



陳水扁不懂梵蒂岡「俗」即政治的一面，吳敦義卻不懂「聖」的一面。

【圖二】吳敦義副總統（右四）訪問梵蒂岡（取自中央社）



前任台灣駐教廷大使戴瑞明（1996~2003 在任），在近代政治脈絡下，對台梵關係作詳細的研究。他認為雖然中國大陸常對台梵關係施以恐嚇，其實北京和台北應作交談。若中台雙方能和平共存的話，梵蒂岡可免卻爲了大陸的 1,200 萬教徒而要中斷與台灣外交的痛苦選擇。<sup>62</sup> 根據戴氏的說法，教廷願意促成北京和台北和解的對話。不過，近年中國已逐漸崛起，朝向強國邁進，中南海的領導人，不會接納中國和台灣和解，而長期的共存。再者，中共領導人越發覺得在統一台灣的策略上，

<sup>62</sup> 戴瑞明，〈教廷外交與當前中梵外交關係〉，9~13 頁。

梵蒂岡能做的越來越少。因此在梵蒂岡的外交上，台梵關係和中梵關係共存，只是台灣的海市蜃樓的幻覺而已。

在 2000 年代，重建中梵外交關係，並非中共優先處理的事務。根據接近中方的比利時籍韓德力（Jerome Heyndrickx C.I.C.M.，1931~）神父透露，在中共最高決策層面，並非人人贊成與梵蒂岡談判。<sup>63</sup> 在馬英九總統任內，北京認為兩岸關係自 1949 年以來，未有如此順暢，不但在海峽兩地間天主教徒的來往倍增，在 2001 年台灣政府更進一步准許大陸的神父修女到台北輔仁聖博敏神學院進修，這是在中共的統戰策略下，中梵台三邊政府互動的先例。<sup>64</sup>

2011 年 12 月 2 日教廷教育部長高澤農（Zenon Grocholewski，1939~）樞機來台，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探認協定」，這是教廷與台灣首次簽訂的國際性協定，讓中華民國境內大學和教廷轄下全球的天主教大學的學位和資格，能互相承認。<sup>65</sup> 北京方面希望國民黨的馬英九總統在台繼續執政，因為

---

<sup>63</sup> Jerome Heyndrickx, "Vatican II Changed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Open Policy Changed China that Should Make Dialogue Possible between Rome and Beijing",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Studies: Wh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Meet* (Taip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23~24 May 2014).

<sup>64</sup> 作者 2011 年訪問台北洪山川（1943~）總主教時獲此消息；2013 年 5 月作者在輔仁大學校園遇見不少從大陸到台進修的修女。

<sup>65</sup> Bernardo Cervellera, "Historic Agreement between the Holy See and Taiwan on the Recognition of University Degrees", *Asia News*, 12

這時期的兩岸關係是北京最滿意的。可見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是直接影響中梵關係並折射到台梵關係的穩定性之上。

台灣肯定是北京為統一的緣故要統戰的對象，北京的「一國兩制」、「台人治台」、「五十年不變」和「高度自治」等策略，先在香港實驗，後在台推行。在香港這些策略慢慢褪色，在習近平治下甚至已蕩然無存，已由「一國一制」所取代。這政策當然對台灣從開始就毫無吸引力。2016 年總統大選期間的競選口號和標語，赫然有「若選國民黨，台灣變香港」<sup>66</sup> 的口號。這表明台灣年輕一代非常留意大陸在香港的措施，對大陸有避之則吉的心態。

## 五、空前美好的台梵關係

有人認為台灣和梵蒂岡的外交關係牢固與否，很大程度視乎中梵關係發展到甚麼階段，所以認為台梵關係在中梵關係的陰影下發展。中梵談判還有一大段路要走，若中方沒有誠意，而教廷死守教律和教義的底線，則談判很難有結果，台梵關係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在這種邏輯推算下，北京的「得」是台北的「失」；反之，台北的「得」是北京人的「失」。據前任教廷駐華代辦陸思道蒙席說，梵蒂岡覺得很不舒服地被放在北京和台灣的得失之間，希望跳出零和遊戲的框架，尋找有利

---

February 2011.

<sup>66</sup> 作者在 2016 年總統大選期間，在台北聽見選舉車上廣播的宣傳口號。

雙方的辦法，進行外交活動。<sup>67</sup> 當時教廷的觀點，是要嚴肅地考慮，必須放棄台灣，然後才得與北京締結中梵協議，修補破裂的關係。究竟能否找到中梵台三方面，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

台灣的天主教人口近年不斷滑落——2008 年有 29 萬人，2014 年減至 23 萬人。雖然天主教在台灣有 7 個教區，但較諸其他地區，畢竟是個小型教會，教廷仍保留大使館在台北，自 2011 年 12 月更派兩名外交人員駐守辦公。教廷的人力資源相當緊張，自然將人手放在教務蓬勃的地區，但駐台人員不減反增，反映教廷對台灣有特別的照顧。近年台梵的互動，是建交 70 多年來未曾有的頻繁。

2011 年教廷與台灣簽署的高等教育合作協議，雙方互認學歷。台灣和教廷高層官員來往，馬英九總統伉儷於 2013 年 3 月 19 日到梵蒂岡參加教宗方濟各 (Pope Francis, 1936~) 的就職典禮彌撒。彌撒後，教宗接見小部分參禮的國家元首，馬英九總統伉儷列於其中，以國家元首名義獲教宗接見，雙方甚至還有一小段的談話。這是中華民國元首和天主教元首，第一次歷史性的會面。這次馬總統會見教宗，為台灣是外交上的莫大榮譽。

---

<sup>67</sup> Shih Hsiu-chuan, "Vatican Promotes Beneficial Alliances: Envoy to Taiwan", *Taipei Times*, 20 March 2015.

【圖三】馬英九總統伉儷參加教宗方濟各的就職典禮彌撒



還有吳敦義副總統在 2014 年 4 月到梵蒂岡參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若望廿三世的宣聖大典彌撒，彌撒後蒙教宗方濟各接見。2014 年 10 月外長林永樂（1950~）訪梵蒂岡，參加教宗保祿六世列真福品典禮，林部長其後與國務卿帕羅林（Pietro Parolin，1955~）樞機交談了 40 分鐘，討論台梵關係。2016 年 9 月 4 日副總統陳健仁（1951~）參加德蘭（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1910~1997）修女的宣聖禮，也蒙國務卿帕羅林接見。他在席上對旅義台籍華僑和台北愛樂團成員表示，台梵關係好比「與愛人和同心合意的人結合」。

教廷官員來台訪問，也是對台灣友好的表示，近幾年訪台者計有教廷教育部、獻身生活會及使徒生活團部、萬民福音部、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宗座「一心」委員會、宗座新福傳委員會等的部長或主席。由 2000 至 2016 年教廷 5 次派出特別代表，參加中華民國總統的就職典禮，包括 2016 年教廷派駐日本大使車納德（Joseph Chennoth，1943~）總主教來台，出席蔡英文

總統就職。

至於文化和學術領域，交流亦相當頻繁。最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並為建交 75 年來首次發生的，是 2015 年 9 月宗座西斯汀小堂合唱團在香港、澳門和台灣巡迴演唱。這個歌詠團是教宗座堂的歌詠團，要得到教宗的允許才可出國旅行演出，他們亞洲之行可以解讀為教宗對此三地教會的重視。<sup>68</sup> 2015 年 11 月宗座禮儀委員會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簽訂協定，於 2016 年 5 月由梵蒂岡博物館借出 60 件宗教藝術品在故宮博物院展出。有史以來，梵蒂岡未嘗將如此大量的藏收品借予館外任何地方展出，台灣成為第一個先例。

近年來教廷特地揀選台灣，作為其屬下機構召開國際會議的地點，以表示台梵關係密切。最近舉行的，包括 2017 年 11 月 13~16 日在靈鷲山的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第六屆佛教徒與基督徒對話國際研討會，<sup>69</sup> 以及 2017 年 10 月 1~7 日在高雄的宗座海員協會第廿四屆全球會員大會。

## 六、總結

中梵外交關係始自 1942 年的南京國民政府，因當時教廷在國際舞台上無太大影響力，所以國民政府列為公使級外交，

---

<sup>68</sup> “Sistine Chapel Choir Readies for 1st Taiwan Concert”, *Taiwan Today*, 23 September 2014.

<sup>69</sup> Sophia Yeh and Kuo Chung-han, “Vatican Friendship with Taipei Based on Shared Values: Holy See”, *Central News Agency*, 6 March 2016.

南京派出全權公使常駐教廷。國民政府和梵蒂岡的外交關係，在國民政府撤退台灣後稱為台梵關係。1978 年中國大陸門戶重開，梵蒂岡希望與北京重建外交關係。台梵關係在蔣經國時期相當穩定，因毛澤東對梵蒂岡的招手示好置之不理。

北京利用台梵關係中斷的威脅作為國策，目的是迫使台灣孤立於國際社會。在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中梵非正式交往頻繁，指向日後的中梵修和而重建外交關係；這些動作給台灣帶來不安，因為中國提出中梵建交的條件之一，是要梵方先切斷台梵關係。

在冷戰時期，梵蒂岡推出綏靖式的東方政策，對共產國家妥協與周旋。台灣在這陰影下戰戰兢兢，不知台梵關係會否中斷。過去 30 年來，台灣與教廷的關係由雙邊關係發展成中梵台的三邊關係。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台灣亟需梵蒂岡作在歐洲唯一的橋頭堡。在馬英九總統任內，中梵建交的可能性極低，台梵關係則繼續發展；但到了蔡英文總統時期，事態有新的發展。<sup>70</sup>

---

<sup>70</sup> 關於〈蔡英文總統時期的中台梵三邊關係〉，作者另撰專文，收錄於即將出版的新書《台灣天主教研究》（輔大神學叢書 141，台北：光啓文化，2020 年 3 月出版）中。